

<<九三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九三年>>

13位ISBN编号：9787805678115

10位ISBN编号：7805678111

出版时间：1998-12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法]雨果

译者：桂裕芳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九三年>>

内容概要

《九三年》是雨果晚年的重要作品，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

他在《笑面人》（一八六九）的序中说过，他还要写两部续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

前者始终没有写成，后者写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

这时，雨果已经流亡归来；他在芒什海峡的泽西岛和盖尔内西岛度过了漫长的十九年，始终采取与倒行逆施的拿破仑三世誓不两立的态度，直到第二帝国崩溃，他才凯旋般返回巴黎。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对普法战争的悲惨战祸和巴黎公社社员的浴血斗争，眼前的现实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再一次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他回顾历史，法国大革命的史实给了他启发，他有心通过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叛乱，阐发自己的思想。

这个念头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经出现，如今写作时机成熟了。

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天主会给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敌人称之为庞大得出奇的巨大计划吗？我年迈了一点，不能移动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耸的大山啊！”

《九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

”显而易见，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轻易不肯动笔，因而酝酿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

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历史背景的工作。

关于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忆录》（一八〇三-一八〇七），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党叛乱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从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语、服装和生活方式的细节，还有各个事件。

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活动，他参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

关于国民公会，他参阅了《日通报》汇编。

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国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条书签，上写：“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关键局势。

”这一天成为小说的出发点。

他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和他的朋友克拉尔蒂著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史实》，另外，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给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生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

雨果并没有让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而是驾驭这些材料，创作出一部生动而紧张的历史小说。

应该说，雨果对法国大革命并不陌生，他生于一八〇二年，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持有保王党观点。

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

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他有切身的感受。

不过这时雨果早已改变了早年的保王派观点，他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已成为共和派，他是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

雨果不想写作一部通俗的历史小说，他不满足于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一般进程，而是想总结出某些历史经验。

《九三年》这部历史小说的切入角度是独具慧眼的。

雨果选取了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作为小说的背景。

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党，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着得到国外反法联盟支持的保王党发动的叛乱，以及蠢蠢欲动的各种敌人，雅各宾党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派出共和军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乱，终于使共和国转危为安，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

雨果在小说中指出：“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

革命怎样呢？

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

<<九三年>>

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

”他又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

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

”以这一年发生的事件来描写大革命，确实能充分反映人类历史中最彻底的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雨果尊重历史，如实地展现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描写出这场斗争激烈而壮伟的场面。

在小说中，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

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绝不饶恕”。

保王主义在一些落后地区，如布列塔尼拥有广泛的基础，农民盲目地跟着领主走。

他们愚昧无知，例如农妇米歇尔·弗莱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泰尔马什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却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

农民的落后是贵族发动叛乱的基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状况。

面对贵族残忍的烧杀，共和军以牙还牙；绝不宽大敌人。

在雅各宾派内部，三巨头--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虽然政见有分歧，但都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

他们选中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的西穆尔丹为特派代表，颁布用极刑来对待放走敌人的严厉法令。

因为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

其次，雨果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

他把国民公会喻为酿酒桶，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

国民公会宣布了信仰自由，认为贫穷应受尊敬，残疾应受尊敬，母亲和儿童也应受尊敬；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国家监护的人；谴责贩卖黑奴的罪恶行为；废除了奴隶制度；颁布了义务教育制；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博物院；统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创办了电报、老年人救济院、医院；创建了气象局、研究院。

这一切措施都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芒，造福于人民。

大革命所进行的乃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想，是以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代替愚昧落后的封建体制。

至今，上述各项措施继续起着良好作用，并普及到世界各国。

对法国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阶级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

雨果捍卫法国大革命，包括雅各宾派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立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现出真知灼见。

《九三年》以雄浑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历史面貌，是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

不过，对于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雨果并没有完全加以肯定。

雅各宾派为什么会失败？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雨果也进行了哲理的沉思。

在他看来，尽管一方面是刀光剑影，以暴力对付暴力，但另一方面，应有仁慈，要以人道对非人道。

他认为，雅各宾派滥杀无辜，没有实行人道主义政策，以致垮台。

这一沉思表现在小说结尾。

人们历来对这个结尾争论不休，难以得出结论，小说的魅力却很大程度来自于此。

从艺术上看，《九三年》的结尾是出人意料的，同时写得扣人心弦。

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围困在图尔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为人质的三个小孩来交换，请蓝军司令官戈万放了他，戈万断然拒绝。

可是朗特纳克得到别人帮助，从地道逃了出来。

<<九三年>>

突然他听到三个孩子的母亲痛苦的喊声：三个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没了。

朗特纳克毅然折回来，冒着危险，救出三个小孩，他自己则落到共和军手里。

戈万震惊于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思想激烈斗争，认为应以人道对待人道，便放走了朗特纳克。

特派代表西穆尔丹是戈万小时的老师，他不顾广大共和军战士的哀求，坚决执行“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便要处以死刑”的法令，铁面无情地主张送戈万上断头台。

就在戈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也开枪自杀。

西穆尔丹、戈万和朗特纳克是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从政治观点的敌对，转化而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

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

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

在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

对此，戈万在沉思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特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恶魔，这个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赎回了种种野蛮行为，救了自己的灵魂，变成无罪的人。

小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像异峰突起，使矛盾达到白热化。

如何处置与评价朗特纳克和戈万的行为，构成了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引起读者不同的看法。

毫无疑问，与其说是戈万在沉思，不如说这是雨果的想法。

倘若朗特纳克是个一般的保王党人或一般的叛军指挥官，他舍身去救三个处在大火包围中的小孩，那么这还是可以想像的。

令人费解的是，朗特纳克是个异常冷酷的人，他出现时曾经毫不怜悯地枪杀蓝军中随军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个尚不懂事的孩子，作为向共和军要挟的人质，也正是他要放火烧死他们，准备同归于尽。

试问，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内心怎么还能容纳得下人道主义思想？

他怎么会在一时之间改变本性，产生人道主义？

雨果并没有描绘在这一瞬间，他内心的思想活动，因而读者也无从理解这一行动的可信性。

不能不说，雨果没有拿出充分的依据去证明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或者说恶魔）是怎么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所以，朗特纳克返回去救三个孩子的行动，只是对作者的“慈悲心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这一观点十分概念化的图解。

至于戈万，他的行动倒是描写得有根有据的。

雨果早有交代，说他在打仗时很坚强，可是过后很软弱；他待人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女，释放俘虏，给教士自由。

他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他曾对西穆尔丹说，他赦免了战败后被俘获的三百个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是无知的，但他不会赦免朗特纳克，因为朗特纳克罪大恶极，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罢。

法兰西才是他的兄长，而朗特纳克是祖国的叛徒。

他和朗特纳克誓不两立，只能你死我活。

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与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称。

例如，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卫是很自然的，虽然他一有可能便会咬人。

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恐怖政治会报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

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

<<九三年>>

须做我们的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

”这些话为他后来的行动按下了伏笔，虽然是雨果的观点，但与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的。

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

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时也包含着弊病。

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

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

从这种观点出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

应该说，雨果在小说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错。

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能保存自身。

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上了断头台的原因。

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处死几百人。

因此，雨果提出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

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能实行人道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

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他的观点集中表现为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

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

就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

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进一大步。

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道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

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三个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

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

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

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

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

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

小说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

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

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

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

他既正直又可怕。

他虽然崇高，“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包围着。

”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

<<九三年>>

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

”他屡次警告戈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

”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实。

在判处戈万死刑之后，他再一次同戈万交锋。

戈万纵横捭阖，畅谈他的理想，西穆尔丹无言以对，败退下来。

他承认戈万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内心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

“他有着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

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

西穆尔丹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

”他亲手处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和学生、他的战友，最后在痛苦与惶惑中开枪自尽。

通过他的悲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

西穆尔丹是有代表意义的、相当真实的一个形象。

作为浪漫派的领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雨果的一个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将无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绘得如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神奇、动人心魄、令人惊叹。

小说开篇对战舰上大炮的描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这艘名为巨剑号的军舰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弹的大炮从炮座上滑脱了，它变成了一头怪物，它在舰上滚来滚去，旋转，冲撞，击破，杀害，歼灭，又像握城锤在任性地撞击城墙：“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

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

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弹跳起来。

……暴风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

”这门大炮完全解除了军舰的战斗能力。

雨果丰富的想像力将这个场面描绘得令人叹为观止。

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壮的场面中，朗特纳克出现了，显出他的严厉、冷峻和刚毅。

这个阴惨惨的、色彩神秘的开场给小说定下了悲剧的调子。

雨果就以这样的笔法，营造出残酷的、命运捉摸不定的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雨果认为这种浪漫手法同样能达到真实，他在小说中说：“流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

传奇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传奇的真实是在虚构中去反映现实。

”浪漫手法与写实手法是殊途同归。

众所周知，雨果是运用对照手法的大师。

他在《克伦威尔·序》中曾经指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共存，光明与黑暗相伴。

”这条准则始终指导着雨果的创作。

《九三年》同样运用对照手法，不过，这部小说不像《巴黎圣母院》那样运用人物形体的对照或形体与、心灵的对照。

小说三个主要人物的对照表现在思想上：朗特纳克性格残酷无情，顽固不化，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也具有成为领袖的威严和果敢。

他心中并无一丝人道感情，只是在最后才人性复现。

西穆尔丹同样坚定不移，朗特纳克坚信保王主义，他则坚信共和主义，特别是坚信恐怖政治。

<<九三年>>

他反对实施仁慈，不相信人道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应该说，他比朗特纳克的心肠更硬，对维护自己的信念更加一丝不苟。
这两个人物都受到雨果的批判。
戈万既有实行革命的坚定性，又有面对复杂现实的灵活性。
他是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化身：他为了人道主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三个人物思想上的对照与矛盾，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雨果的小说技巧在《九三年》中达到了更成熟的地步。
小说情节的进展异常紧凑，看不到多少闲笔和题外话，不像《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那样，常常出现大段的议论或枝蔓的情节。
作者的议论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更高明的手法。
从结构上说，小说环环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
高潮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
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